

## 流动性叙事研究

# 流动性、“绅士冒险家”与集体记忆

## ——《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的“魏玛现代性”

胡强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伊舍伍德的作品呈现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互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通过对主人公的多重厚描,刻画了晚期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变迁。消费欲望、生存焦虑与战时记忆弥散于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同时也通过个体的经验幻化成一种无力感。诺里斯固守绅士的外表,其内心早已被“奢侈”的物欲理念所异化。绅士价值观在诺里斯身上的瓦解体现了伊舍伍德对欧洲现实的反思,折射出英国价值体系在文明危机中的困境。诺里斯的沉沦意味着某种看似稳定的身份符号已经断裂。在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上,诺里斯的“奢侈”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情感审视和历史感知,推动小说建构了一个由历史大叙事与个人小生活交织而成的时代场域。

**关键词:**伊舍伍德;奢侈;冒险家;社会变迁;魏玛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093-09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07

### 0 引言

《诺里斯先生换火车》(*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1935)和《再见吧,柏林》(*Goodbye to Berlin*, 1939)被合称为“柏林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国为背景,描写了经济危机、政党斗争、种族主义三重重压之下的社会现实。魏玛共和国始于1918年,1933年纳粹上台时结束。德国民众对一次大战仍心有余悸,对奔涌而来的社会剧变感到茫然无措。“极端的经济困境、巨大的社会对立和深刻的文化矛盾”(维尔申,2018:52)构成了这一时期典型的情感结构,与此同时,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在社会心态中浮现,可以说,魏玛共和国“集合了欧洲普遍存在的共性与(德意志)民族的特殊个性”(维尔申,2018:56)。这种矛盾结合不仅构成了今天我们理解“魏玛现代性”(Weimar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文学中的社会变迁主题研究”(18AWW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强,男,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区域国别、文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

**引用格式:**胡强.流动性、“绅士冒险家”与集体记忆——《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的“魏玛现代性”[J].外国语文,2026(4):93-101.



本刊微信公众号

Modernity)的前提,也形塑了一种分析其独特历史进程的思想视野。

“魏玛是由各种刺耳的声音和炫目的图像构成的。”(韦茨,2021:208)“魏玛现代性”意味着生活的碎片化,是把握魏玛社会变迁的关键词。在《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一书中,韦茨以微观视角进入宏大历史空间,勾勒了魏玛共和国14年的进程,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魏玛现代性”这一关键词切入伊舍伍德的作品,读者不难发现文字背后所潜藏的历史互文,重大事件与小人物命运交汇碰撞,呈现出一幅厚重的思想画卷。主人公诺里斯(Norris)曾言:“我们这一代人的教养是,要从审美的立场来观察奢侈。”(伊舍伍德,2016:12)“审美”与“奢侈”在魏玛现代性的语境中体现了何种变迁意涵的关联?书中人物弗兰克·哈里斯曾对诺里斯说,“你和我已是绅士冒险家里的末代子遗”(41)。结合诺里斯的英国人身份和战后德国局势来看,“绅士冒险家”体现了怎样一种复杂的历史想象?诺里斯自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77),“最高要求就是安定”(194)。诺里斯的精神困惑以及对安定的渴求体现了怎样一种充满不确定感的时代氛围?这种时代精神与魏玛现代性通过人物命运又形成了何种深层的对话关系?

## 1 流动性与“奢侈”

布雷德肖与诺里斯在火车上相识。在现代性语境中,火车体现了一种速度与流动互为交织的穿透力量,封闭的车厢暗喻了一种理性秩序,在推进平等的同时又扩大了一种隐性的阶层意识。车窗外,景观快速后退,车窗内,人们在局促空间中守护着心理边际。狭窄的过道,两人撞了个满怀,“都不知所措,都打算道歉”。这一幕体现了火车特有的场域感。车厢等次意味着阶层不同,而身体距离也微妙地显现出这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眼前这个男人流露出一一种“茫然,空洞”,问及有没有火柴时,对方反应很慢,“手指围着背心剧烈地划拉了几下”,这些动作显露出一种防御感,“想脱衣服,想掏手枪”,或者只是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被偷(1)。碰撞与试探等细节交错浮现,两人的动作折射出动荡年代一种特有的心理状态。

火车上的座位意味着现代人的感官体验陷入了一种“既被视觉定位、又被视觉所迷惑”(希弗尔布施,2018:122)的困局。“车厢里孤立的自我”和“火车强有力的机械运动”聚合在一起,给旅客带来了一种“自我遗忘的愉悦感”(希弗尔布施,2018:126),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现代人的感官体验和运输工具存在着隐秘的关联。火车上的“陌生人”之间,那种“沉默以对的尴尬”不仅显露出“犹豫不决、沮丧”,也体现了一种人际交流中的情感断裂(希弗尔布施,2018:123)。诺里斯的着装和做派传递出一种与品味、等级相关联的身份信息,也显现出某种特定的文化症候。短暂靠前之后,又回到了座位,诺里斯似乎仍不放心,

思忖着自己是不是热情过头。火车以其速度和隔绝“瓦解了旅客与穿越的景观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瓦解了旅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呈现出一种“分解、消失与碎片化”(希弗尔布施,2018:98)。

一顶假发掩盖了诺里斯的年龄,见多识广背后还有一种故作神秘。一战结束之后,诺里斯奔波于各地,瑞典斯德哥尔摩、立陶宛考纳斯、拉脱维亚里加、波兰华沙、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意大利罗马、西班牙马德里、法国马赛、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这些地名关联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凸显了这部小说的政治性内涵。小说以“换火车”为题有其用意,勾勒了流动轨迹,同时也折射出他在身份上的无家可归。诺里斯是英国人,故事发生在柏林,小说结尾诺里斯一路逃亡至墨西哥、巴西、秘鲁、智利、阿根廷,多变的轨迹和小说开篇提及的地名形成了参照,为全书敷设了一种反讽基调,也强化了一种焦虑感。

贯穿首尾,诺里斯的言行举止都体现了与“奢侈”一词的隐喻关联。到餐车享受了一顿,白兰地配上蹄膀,在雪茄醇厚的香味中,诺里斯的情绪似乎达到了高潮。他不无得意地告诉布雷德肖:“我年纪越大就越重视生活里的小享受。”(11)。诺里斯东奔西跑的30年也是欧洲社会经历剧变的30年,动荡、绝望、暴力糅进了他每一段的旅程。可以说,挂在诺里斯嘴边的“奢侈”是切入现实的入口。奢侈与资本主义进程相伴而来,也是其文化意识形态的风向标。诺里斯的口头禅“我这一代人的教养是,要从审美的立场来观察奢侈”可谓意味深长,一方面将诺里斯嵌入了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通过奢侈、审美等关键词的叠合构建了一个理解魏玛现代性的网络。在1913年出版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维尔纳·桑巴特分析了奢侈一词在西方社会的话语流变,对资本主义何以是“奢侈的产物”这一命题进行了社会史的考察。在他看来,从“道德或审美”的角度评判奢侈具有特殊的意涵。奢侈关联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奢侈的“文化需求”则反映更多深层历史的变迁(桑巴特,2021:119)。奢侈体现了“纯粹的感官快乐”,也展现出与“雄心”“炫耀”“权力欲”相关联的政治动机。这些动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其核心体现的是一种基于财富、消费的“出人头地的冲动”(桑巴特,2021:122)。

随着交往深入,布雷德肖逐渐理解了奢侈一词在诺里斯日常生活中的含义。床是在伦敦定做的,诺里斯一直用的是英国的床单和毛毯,在他看来,德国的小床总让人噩梦连连。梳妆台上摆了一排护肤品,诺里斯不无得意地告诉布雷德肖:“一周七天,每天穿一套”,他相信“在生命的关键时刻,按自己的心情精确地着装”(19),是保证生活质量的前提。所谓“关键时刻”,既是指个人经济境况,也是指眼下动荡的局势。借由人物口中的这个“关键时刻”,伊舍伍德以隐喻方式表达了与哲学家雅斯贝斯相同的感受:“一切的客观性都已变得模棱两可;真理,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实体,成为令人困惑的迷;现实,则是一种虚饰的伪

装。”(雅斯贝斯,1997:75)雅斯贝斯和伊舍伍德分别从哲学和文学两种进路切入了同一时代的精神状况。在雅斯贝斯看来,衰落“有着精神或心灵上的原因”,特征之一就是“外在的炫示代替了真实的存在,多重性代替了统一性,喋喋不休的喧嚷代替了真正知识的传播”(雅斯贝斯,1997:74)。在诺里斯身上,这种“炫示”“多重”“喧嚷”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细节的过分讲究,不仅是一种癖好,还体现了一种及时行乐。他很清楚,动荡时期,一切都变得脆弱。诺里斯的奢侈消费精准而明确,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与这种明确具体形成了强烈反讽。诺里斯的家有两扇大门,各装有一个猫眼。左边铭牌上写着“亚瑟·诺里斯,私宅”,右边铭牌上写着“亚瑟·诺里斯,进出口贸易”,两扇门其实通向同一个客厅,中间只有一张帷幕隔开。两扇门代表了诺里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生活形态,同一个客厅象征着无论从哪一个进来,通向的都是同一个混杂、暧昧的生活现实。这种对现实的描摹不仅是一种“生活的审美表现”,更是一种“时代的文化表征”(王守仁,2006:1)。诺里斯对布雷德肖的到来表达了欢迎,但布雷德肖却从他那双“不停搓动着”的双手上看出了一种“神经质”(14)。门外要债人的怒吼声打破了安静,诺里斯极为敏捷地把布雷德肖拽进了另一个房间。帷幕挡住了视线,却挡不住门外的叫喊。他开门见客时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手扶着门把手,准备一有情况就立即关上大门”(16)。这看似只是一场要账风波,可一旦结合诺里斯的身份,却可以说是小中见大,呈现出普通人与动荡时代的语境勾连。生活在迷惘困顿之中的德国民众,处在“经济相对停滞”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夹缝之中,这种困局就像是诺里斯家的两扇大门,看似能够选择,可通向的却是同一个无法选择的现实,猫眼外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图景,这种变形恰如新闻中那些“针锋相对,却又相互共存”的说辞,呈现的都是这个时代前所未遇的“冲突性和复杂性”(韦茨,2021:134)。两扇门和同一个客厅折射着诺里斯的心态和生活,也呈现出一个关于魏玛现代性的隐喻,德国处在一个面向多种选择、却难以选择的过程之中。两扇大门也蕴含着玄机,这种差异折射出德国现实的矛盾。一方面大众消费的时代到来了,而另一方面,“政府没有黄金储备,没有道德合法性,也没有实际的经济生产,用以支撑自己的所负担的责任”(韦茨,2021:139)。战争记忆、消费欲望、生存焦虑弥散于社会结构的各个微观层面,同时也通过个体的经验幻化成一种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越失衡,也就越发依赖于一种虚假的安全保护。

## 2 “绅士冒险家”的“别样生活方式”

诺里斯是英国人,常年在德国,小说呈现出一种跨越英德的复合视角。在两次大战的语境中,Anglo-German一词体现了独特的政治内涵。两个竞争国家之间的文学往来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更富紧张意识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关系”(Firchow,2008:ix)。在这部作

品中,诺里斯“绅士冒险家”的角色意识非常鲜明。在韦茨看来,魏玛既是“别样生活方式的鲜明象征,也是道德堕落之骇人警讯”(韦茨,2021:作者序言 i)。沉重的债务让复兴艰难,另一方面追忆往昔一再被“神化”,已经退出舞台的帝国似乎又谋划着卷土重来(韦茨,2021:38)。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谋生,诺里斯的绅士气质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故事开篇,他自言是一个“有独立资产的绅士”(4),而随后布雷德肖却亲眼见到他被债主痛斥为“卑鄙的骗子”,这其中的反差为小说中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诺里斯的境况反映了英国绅士价值观在德国现实中的瓦解。贵族逐渐退出舞台,而绅士也逐渐摆脱阶级血统论的束缚,成为一种文化特性的符号。诺里斯的言行举止是对这一符号的颠覆,他的挣扎折射了身份的瓦解,也呈现了民族性格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变迁。

在布雷德肖眼中,诺里斯是一个“老骗子”,这是一种复杂的感受,包含着对同为英国人的戏谑。布雷德肖对诺里斯的认知既充满着善意,也满带着无奈。他更愿意把诺里斯想象成一个“被美化的人物”,在那些“人性的精微之处”,他觉得诺里斯依然还能体现英国人所珍视的那种独立品格。然而事实上,诺里斯带给布雷德肖的只有痛苦和失望。这位“绅士冒险家”不仅生性胆小,而且还有“轻微的被迫害妄想症”,在伊舍伍德的笔下,厌倦与不安不仅显现了诺里斯形象崩塌背后的苦闷,还包含着一种对传统英国价值观的怀念。诺里斯的绅士形象令人错愕,他的藏书让布雷德肖极倒胃口。“含混、色情、势利”点破了庸俗的品位,也为这个冒险家的文化品格写下了注脚。诺里斯曾因敲诈入狱,在他看来,“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冒险”(42)。他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并坚持认为,“那么多钱放在那儿等着人去捡,这可是很奇怪的事”(44)。诺里斯坚守绅士的外表,而其内心早已被那套“奢侈”的物欲理念所异化。他抛弃了自尊,剩下的只有贪婪。范·霍恩周旋于多国政府之间,为德国收集情报。诺里斯急需金钱,又担心暴露,于是诱哄布雷德肖陪同政府官员前往瑞士与范·霍恩会见。这个情节证明了诺里斯“捡钱”理论的成功和他的权谋算计。在这场骗局之中,他却以布雷德肖的风险为代价赚回了酬金。诺里斯竭尽所能把自己装扮成绅士,但一言一行却又表现出对绅士品格的瓦解。外表的雅致和内心的算计互为表里,体现出一种契合着时代气氛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恰如茨威格对欧洲现实的分析,人们“渐渐习惯在半空中生活,脚下没有坚实的土地,没有权利、自由和安宁”(茨威格,2017:5)。

诺里斯是一个符号,体现着贵族和工商业精神的杂糅传统,这套传统不仅构建了英国的民族性格,也推动着英式价值观随着殖民进程向全球的渗透。这套价值观在诺里斯身上的瓦解体现了伊舍伍德对欧洲现实的反思,也表达了他对未来的隐忧。诺里斯的沉沦意味着某种看似稳定的身份已经断裂,那种确定感已在时代的洪流中被一种流动性所取代。19世纪晚期,帝国盛极而衰,英国传统价值体系在欧洲文明危机中日显尴尬。财富、德行、契

约、信任在诺里斯身上变成了奢侈、谎言、虚伪、脆弱。这个言不由衷的“反英雄”颠覆了英国绅士的精英特质,他残留着高雅的余温却市侩粗俗,他言必称理性却从不敢担当。演讲呈现了诺里斯在政治上的金钱算计,哄骗布雷德肖前往瑞士显露出诺里斯在人性上的权谋考量。只有金钱,才能维系这个绅士的体面,只有奢侈,才能维系这个冒险家对大都市生活的异化性沉醉。与魏玛时代动荡的现实一样,诺里斯精神的分裂也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本质。正如小说开篇提及的那些欧洲地名,诺里斯去得越远,也就意味着他背负的东西愈多,这种状态也正如茨威格所言:“无论何种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种失衡。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就会失却自己的尊严,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有把握。”(茨威格,2017:429)

小说多次出现债款细节,显现出货币已主宰了诺里斯的物质生活,也影响了他的精神世界。在齐美尔看来,货币交换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关联。“货币经济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进行数学计算,很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评估、衡量和计算,把质的价值简化成了量的价值。”(齐美尔,2020:141)可以说,“绅士冒险家”从本质上体现的就是齐美尔所说的“现代的计算特征”。表面上,诺里斯一如传统的绅士,但是他的精神操守早已为物欲所支配,表层生活细节与深层精神断裂将这个“绅士冒险家”以近乎赤裸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眼前,他的荒诞与分裂与齐美尔对物欲人格的批判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只对金钱感兴趣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指责他们冷酷无情,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行为符合逻辑,完全公正,并且没有任何坏的意图。”(齐美尔,2020:127)

### 3 自我呈现与集体记忆

诺里斯曾因诈骗入狱,他的“捡钱”理论体现了物欲操控下的精神扭曲,也体现了个体在动荡时局的被动无力。他曾受邀去贫苦社区演讲,兴致很高,却要求坐出租车。一进大厅,满眼都是反法西斯等反战标语,凸显了小说的社会历史意涵,也强化了与政治场域的深度叠合。在伊舍伍德笔下,台下的工人不是被动的听众,而是改变命运的共同参与者。掌声体现了互动,也以生动的身体语言传递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诺里斯的演讲可以说是一场目的含混的表演。流畅的德语、华丽的辞藻赢得了欢呼,内心的得意也溢于言表。候场时,诺里斯表现出一种焦虑,从“不耐烦”到“差不多要发疯了”,伊舍伍德细腻地抓住了人物情绪之下的那种“任务感”。不同于德共领导人拜尔的自信,诺里斯的烦躁体现的是一种目的与意愿的分裂。“优雅的玩笑”和“一本正经的演说腔调”混杂在一起,以一种反讽的形式凸显出内容与情感的疏离。一面是他高喊着“把外交家徒劳的说辞和豪华饭店的轻歌曼舞统统淹没”(57),另一面却是布雷德肖站在台下对他满眼的屑。听众觉察不到诺

里斯“有丝毫的滑稽”，而熟悉他的布雷德肖却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55）。在这出面具感十足的自我呈现中，从“农民的哀号”到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剥削”，从“出卖活人灵魂的生意”到“欢呼与鼓掌的高潮”，听众不仅接纳了他这个“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绅士”，也接受了他那“时髦的服装”与“食利者阶层的精确与风雅”（56）。诺里斯赢得了掌声，也完成了一种虚幻的身份构建。这种建构一如他那个“绅士冒险家”的角色，映射着社会学家戈夫曼对自我、面具与人性的分析：“在一个极端上，人们发现表演者可能完全进入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中，他可能真诚地相信，他所呈现的现实印象就是真正的现实。”（戈夫曼，2008：15）

《凡尔赛和约》未能解决德国问题，“在每个政治阶段，德国人内部如何相处、如何与邻国相处等这些最基本的议题”（韦茨，2021：92）都会触发激烈持久的斗争。在小说中，诺里斯始终表现为一个政治性的角色，但他对真实的政治却始终刻意保持着一种距离。除了掌声，诺里斯心里记挂的只有酬金。形势紧逼，诺里斯最终逃离了柏林。表面上看，他穿行在政治之间，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热情。而在内心深处，他的畸形趣味则多次暴露他错位的身份认同。从他的言行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虚幻与暴力的德国。小说明线是诺里斯的各种活动，暗线则是通过诺里斯的性格、趣味、习惯所折射出的重大社会事件。生活在异化的环境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愈发扭曲，语言也成为记录这个异化进程的载体：“春天、月光、青春、玫瑰、姑娘、情人、心灵、五月……这些词如同急剧贬值的货币，被描写探戈、华尔兹、狐步舞之类的作家使用，变成了主张个人逃避的东西。”（96）这些词凸显了一种急于宣泄的集体情绪和社会心态，颠覆了对意义的理解，“到夏威夷去，到那不勒斯去，到梦幻的维也纳去”（96）。与这种论调相唱和，电影公司也提供了能满足各种口味的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体优势推波助澜。“战场史诗”“军营生活”“军事贵族”和演员们的流行服装掺杂在一起，“观众被带往了远离当下语境的梦幻世界……或恐惧，或兴奋，或热爱，甚至一齐涌出”（韦茨，2021：238）。镜头所记录的不仅是“香槟酒的美丽泡沫”“灯影下闪耀的丝绸般的光芒”，还有那隐身其后的“愤世嫉俗的美”（96）。在伊舍伍德的笔下，柏林呈现出一种生机与异化共存、希望与沉沦相伴的现代性图景，这幅图景不仅刻画了魏玛晚期社会的矛盾，也抓住了民众内心深处的惊恐。这种感受充满着一种乱世幻象的疏离，就仿佛一个世纪前巴尔扎克对法国的描述，“酒醉能给现实蒙上一层轻纱，使人不再感到难过、痛苦，放下思考的重担”（巴尔扎克，2015：53）。

激荡与虚无如影相随，折射出晚期魏玛狂热与无序的一面。这种虚幻的源头是纳粹对世界的弥天大谎。诺里斯的逃离是一个渺小个体在狂乱时代的选择，是一个曾沾沾自喜于自己“捡钱术”的冒险家意志的崩溃。“四分之三的脸埋进了外衣领子”“脑袋像望远镜一

样缩进了脖子”(186),诺里斯逃离时的那种狼狈让人印象深刻。从柏林到墨西哥,再到巴西、秘鲁、智利、阿根廷,地点不断变换,而他身后的欧洲就像是“一大片的捕鼠笼”,让人“连喘口气的空间都没有”(188)。诺里斯的离去充满着溃败感,“绅士冒险家”的自信不复存在。他自叹道,年轻时,“一位英国绅士走到哪里都受欢迎”(191)。诺里斯的话充满着颜面尽失的无奈,隐含着一种对帝国往昔的哀怜。诺里斯靠政治谋生,从政治中“捡钱”,却彻头彻尾地表现出对政治的背离,他的故事体现了个人与集体在记忆层面的时代汇流,这种汇流也让茨威格的文字再次回响在读者的耳畔:“任何阴影,到头来也只是光线的孩子,一个人,只有经历过了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亡,他才算是真正活过。”(茨威格,2017:455)

#### 4 结语

劳拉·布朗曾以文化寓言为题,分析了18世纪英国文学与现代性一词的同构关系。布朗更倾向于将现代性理解为“由社会、经济形式的复合体而产生的后果”,在激烈冲突的背景之中,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形式所凸显的恰恰是“那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的主要特点”(布朗,2019:导言7)<sup>①</sup>。这或许为我们理解魏玛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诺里斯曾说过,“我觉得自己真像要给历史的漩涡卷走了”(126),这句话既是对个人命运的刻画,也可以说揭示了全书的主旨。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点是“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以最终说明社会压力和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和渴望”(衣俊卿,2011:662)。以日常生活观照文本细节,流动性渗透着情感审视和历史感知,“奢侈”体现了特定阶级的审美意识形态。绅士价值观在诺里斯身上的瓦解体现了伊舍伍德对现实的反思,折射出英国价值体系在文明危机中的困境。诺里斯的沉沦意味着某种看似稳定的身份符号已经断裂。作品提供了进入现代性的微观视角,也构建了理解历史进程的一种阐释性框架,可以说,诺里斯的流动性、“奢侈”及其背后的集体记忆呈现了一种深刻的思想穿透力,推动小说型构了一个由历史大叙事与个人小生活交织而成的时代场域。

#### 参考文献:

埃里克·韦茨. 2021. 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M]. 姚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① 劳拉·布朗:《现代性的寓言: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与文化》(*Fables of Moderni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English Eighteenth Century*), 牟玉涵,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导言”,第7页。布朗指出,“以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全面胜利为中心”,所谓现代性就是指“与上述中心相关的历史转变:经济和生产的本质所发生的变化,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结构变化,文化的定位和意义的变化,以及历史本身概念化的变化”。

-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 2018. 二十世纪德国史[M]. 张杨,王琮颖,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巴尔扎克. 2015. 论现代兴奋剂[M]. 甘佳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格奥尔格·齐美尔. 2020. 货币哲学[M]. 朱桂琴,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
- 卡尔·雅斯贝斯. 1997.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2016. 诺里斯先生换火车[M]. 孙法理,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文中仅标示页码的译文均出自该译本)
- 劳拉·布朗. 2019. 现代性的寓言: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与文化[M]. 牟玉涵,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斯蒂芬·茨威格. 2017.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M]. 史行果,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 欧文·戈夫曼. 2008.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守仁. 2026. 再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构建[J]. 外国语文(2): 1-12.
- 维尔纳·桑巴特. 2021. 奢侈与资本主义[M]. 王燕平,侯小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 2018.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M]. 金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衣俊卿. 2011. 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Firchow, Peter, E. 2008. *Strange Meetings: Anglo-German Literary Encounters from 1910 to 1960* [M].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 Mobility, “Gentleman Adventurer” and Collective Memory: “Weimar Modernity” in *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HU Qiang

**Abstract:** Christopher Isherwood’s works present a profound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portrays the social changes of the late Weimar Republic through the nuanced depiction of its protagonist. Consumption desires, survival anxieties, and wartime memories permeate various micro-level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ing into a sense of helplessness through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lthough Norris maintains the image of a gentleman, his inner self has long been alienated by the notion of “luxury” and material desire. The disintegration of Norris’s gentlemanly values reflects Isherwood’s contemplation on European reality and highlights the predicament of traditional British values in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Norris’s downfall signifies the breakdown of seemingly stable identity symbols. In the dimension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Norris’s “luxury” presents a profound emotional and historical awareness, driving the novel to shape a field wher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small-scale personal lives converge.

**Key words:** Isherwood; luxury; adventurer; social changes; Weimar modernity

责任编辑:冯革